

利用服务业带动 经济增长

促进亚洲服务业的发展是使
该地区的重塑平衡并推动经济增长
的另一条途径

Olaf Unteroberdoerster

Archana Nanancherla将印度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归结于其同胞的吃苦耐劳。她声称：“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印度人民更加勤劳……这是我们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过，对于印度国内需求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而言，其真正的推手很可能是Nanancherla本人以及像她那样接受过良好教育、在服务业工作、可支配收入正不断增长的人们。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印度规模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公司。Nanancherla大学一毕业就被该公司录用。目前她担任该公司的项目经理，管理着一个由多达120人组成的团队，月薪约为5000美元。她的生活道路为其他旨在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亚洲经济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保持亚洲经济的增长势头

不过，与印度不同的是，亚洲很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出口。这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得到印证，当时美国和欧洲需求的急剧下降使得亚洲地区遭受重创（见本期“亚洲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一文）。因此，对亚洲众多经济体而言，其中期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将是如何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扩大国内需求——目前印度已确立了这一发展模式。

很多观察家将亚洲发展失衡归咎于私人消费疲软——通常称为亚洲的“储蓄过剩”——或投资疲软。然而，从供给层面上讲，亚洲通过发展服务业来提高产值将有助于恢复这种平衡并促进经济增长。

部分亚洲经济体的消费或投资水平可能过低，但整个亚洲地区不能以“疲软”二字概括。在亚洲的各个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占其GDP的比率差别很大。将各个经济体的具体差异和长期的历史模式纳入考虑，我

们可以发现另一层面的细微差异。有关亚洲各经济体内部需求失衡的经验性证据也呈现出各种特点。

不过，相对于需求层面，人们很容易忽略亚洲因高度倚靠出口而带来的供给层面的问题。该地区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已导致其生产结构的不平衡，使其过度倚靠于贸易制造品，也就是说大部分依赖于工业（IMF，2010）。比如，中国的工业产值占其GDP比重约为50%，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的两倍，比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高出10个百分点。这种对工业的过度依赖也体现在亚洲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如东盟四国，甚至包括一些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见图1）。在所有这些经济体中，工业占GDP的比例都偏高，通常比同类国家高出5到10个百分点。

在过去十年间，亚洲各经济体对工业的过度依赖有所增加。全球经济研究结果证实，亚洲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四国）的工业在其各自的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促进“微笑服务”

由于亚洲过度依赖出口，因此按照国际标准而言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普遍较低也便不足为奇了。比如，2008年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近13个百分点。对于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亚洲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而言亦是如此。有关就业模式（即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分布状况）的研究证实，亚洲的各个经济体过度倚仗工业发展，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

工业占主导地位是亚洲各个经济体增长强劲以及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快速工业化使得数亿亚洲工人摆脱低收入工作，尤其是生产力水平仍然极低的农业劳作（见图2）。不过，亚洲未来的增长将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亚洲各经济体（由日本和韩国开始）步入后工业时代，服务业必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赶上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到目前为止，亚洲地区的服务业生产力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这与近年来美国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如何才能使服务业帮助亚洲各经济体实现更大且更为平衡的发展呢？

也许，印度的发展模式可资借鉴。服务业已成为印度经济最为活跃的行业之一，在过去二十年间一直引领该国GDP的增长。与亚洲其他经济体所不同的是，印度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率常常超过其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增长率，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 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印度提供了充足的、训练有素且会讲英语的工人，使其得以进入不断发展的国内和全球市场；

- 对服务业成功地解除管制；
- 私有化；
- 境外直接投资；
- 金融业改革。

释放增长潜力

广泛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解除管制且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可以释放出服务业的增长潜力。改善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获取程度，有助于缓解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其中小型企业往往是服务业重点领域的主导力量（如零售业）。在韩国，中小企业占服务业总产出的80%。

某些情况下，汇率升值将使非贸易品行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从而有助于资源向该行业转移。继而将降低贸易品行业的利润率，同时提高非贸易品行业的利润率。同样，劳动力市场改革（旨在为劳动力的雇佣和解雇提供便利）以及再培训激励计划将会有助于资源再分配的顺利进行。在亚洲很多经济体中，政府已制定了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加大基础设施相关服务的竞争程度，放开零售业和金融业，并解除对

外国企业进入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的限制。

上述改革措施不仅将使服务业从中受益，也将进一步带动国内需求。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各经济体中的企业投资对内部资金的可获取性更为敏感。企业发现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外部资金来进行投资。对于那些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型服务企业而言，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小型服务企业对融资的可获取性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得到改善：金融机构进一步转向根据风险程度发放贷款；修改担保法，使企业可以利用房地产和其他类似固定资产以外的多种类型的资产获得贷款；以及通过有针对性的减税措施扩大风险资本的出资额（马来西亚就已如此）。菲律宾于2008年设立的“信贷信息公司”——正如菲律宾所采用的那样——深化了信贷信息并扩大了征信覆盖面，从而提高了银行对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中小型企业通过现代化的公司重组框架降低信贷风险，也将有助于改善企业获取融资的便利程度。

例如，通过收购银行的不良贷款并将之重新打包出售给投资者，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已成功地创建了韩国企业不良债务市场。类似的公司可以专门从事对小型企业的不良债务进行重组。

亚洲地区总体投资和商业环境的改善正为其更加注重以服务业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不过，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所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相关的观念仍未跟上最新的发展形势。比如，对于亚洲地区基于投资者看法的指标（如政府治理水平——曾随着亚洲金融危机而恶化）而言，其目前仍然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并对本经济体的投资活动构成阻碍。今后，亚洲经济体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继续增强其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如香港特区政府就通过了竞争法）；为境外投资者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如马来西亚最近就降低了对境外投资进入服务业的门槛）；确保履行合同并降低行政管理瓶颈（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就为境外投资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点）。唯有采取这些措施，亚洲地区才能充分释放其增长潜力，以Nanancherla为代表的亚洲人才会相信，除了同胞们的吃苦耐劳，还有其他因素可以支撑经济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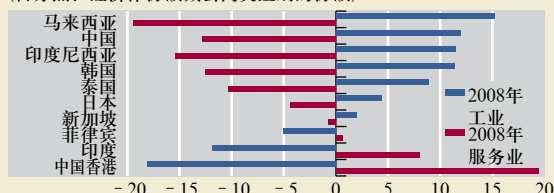
Olaf Unteroberdoerster现任IMF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本文基于作者与Adil Mohommad和 Papa N’Diaye在2010年发展的研究报告“亚洲是否需要再平衡？”的第三章（《地区经济展望：亚太地区》（2010年4月））。

图1

重视工业，轻视服务业

亚洲绝大多数的经济体目前仍过度依赖于工业，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较低。

（百分点：经济份额减去同类组别的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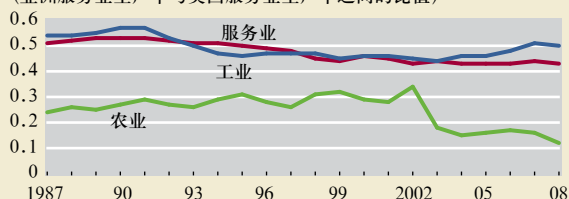
注：对同类组别的定义源于《世界发展指标》。分为同类组别的经济体为：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OECD）；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印度（下中等收入国家）；马来西亚（上中等收入国家）。

图2

亚洲地区停滞不前的服务业

亚洲的服务业是其潜在的增长引擎之一。

（亚洲服务业生产率与美国服务业生产率之间的比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IMF工作人员的估算。